

纳西族史诗《创世纪》的英译探源及考辨*

朱燕秋**

第1節 緒言

第2節 纳西族典籍《创世纪》的英译者探源与考辨

第3節 纳西族典籍《创世纪》英语译本的百年流变

第4節 结论

〈국문초록〉

일백년 전부터 나시족(納西族) 典籍의 翻譯은 줄곧 국제학계 학자들의 주목을 받아왔다. 나시족 典籍을 처음 英文으로 번역한 譯者와 그 번역본에 대한 논쟁은 국내의 학계에서 이미 오래전부터 진행되어 왔지만 그러나 여전히 衆論이 分分하다. 어떤 학자는 조셉 로크(Josep Rock)가 나시족 典籍을 본격적으로 연구한 첫 번째 학자라고 주장하였고, 또 어떤 학자는 나시족 典籍의 漢譯(中文翻譯)과 외국어번역은 1930년 전후 麗江에서 활동했던 미국선교사 앤드루스(Andrews)로부터 시작되었다고 주장하고 있다. 그러나 로크와 앤드루스가 중국에 來華하기 훨씬 오래 전에 네덜란드 선교사 엘리스 샬튼(Elise Scharten 1876-1965)이 나시족 典籍을 번역했는데 나시족의 民族敍事詩《創世記》가 바로 그중의 한 작품이다.

《創世記》는 나시족의 三大 敍事詩 중에서 첫 번째 詩歌이자 가장 많이 번역된 나시족 典籍이며, 국제 나시학계에서 줄곧 심혈을 기울여 연구하는 전적이기

* 本論文獲得“国家留学基金委“2018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2018085200004)”而完成的。(This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 “Special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in Western China in 2018”(No. 2018085200004)).

** 朱燕秋: 贵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課程研究生。

도 하다. 그러나 현재 중국 국내의 나시족에 관한 번역연구 중에서 샬튼과 그의 번역본에 관한 연구는 거의 찾아볼 수가 없다. 본 논문은 나시족 典籍의 英譯에 대한 전반적인 탐구와 정리를 통해서 일백년 동안 진행된 나시족의 民族敍事詩 《創世記》의 英譯 변천과정과 이런 영역활동이 국내외의 나시학계에서 가지고 있는 시대적 가치와 문화적 의의를 더 심도있게 이해할 수 있기를 기대한다.

핵심어 : 나시족(納西族), 민족서사시 《창세기》(民族敍事詩 《創世記》),
전적비역(典籍翻譯), 샬튼, 로크, 나시학(納西學)

第1節 緒言

近年来,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外译越来越受到关注。挖掘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经典文学, 并将其译介到华语世界之外, 使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 不仅能够世界文化的场域里呈现出不同于主流文化的民族视角, 也有助于民族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传承, 逐渐改变该部分在对外文化传播与研究上的边缘化态势。但是, 据统计, 在2004年以前, 进入外国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仅有九部。¹⁾ 在2004年至2012年期间“走出去”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仅有10部中短篇小说集。²⁾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目前为止少数民族文学外译的数量还是十分有限的。究其原因, 这与少数民族文学对译者的要求密切相关。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 尤其是民族典籍的外译对译者的要求较多且较高。

1) 陈珞瑜, <后殖民视域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外译现状、策略、途径及出路>, 《外国语文研究》, 2017(05):79.

2) 魏清光、曾路,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机遇、现状、问题及对策>, 《当代文坛》, 2016, (2):110.

首先要求译者需要懂得并能够熟练运用民族语言和目的语，其次译者还需了解这两种语言的传统文化与表达方式。这就在无形中增加了外译的困难，能够达到这些要求的译者少之又少。于是，有的译者不得不采取先从少数民族语言译为汉语，再接着将汉语译为外语这一路径。但这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翻译”或“二手翻译”，而非“直接翻译”了。在“间接翻译”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本需历经民族语言——汉语、汉语——英语的双重语言过滤。语言的双重过滤有可能会造成文化信息的缺失，以至于影响到译文的纯真性和精准度。从而导致能够真正“走出去”并在国外得以接受和传播的典籍更是罕见。但纳西族的典籍却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走出”国门了，并在国际纳西学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现在，英国、美国、德国、荷兰等很多国家的图书馆里都收藏着纳西族典籍的手稿、译稿和相关文献。

关于纳西族典籍的首位英语译者及其译本的探究和争论在国内外学界由来已久。英国人类学家安东尼·杰克逊 (Anthony Jackson) 梳理了从19世纪后期纳西族与西方的第一次“接触”到20世纪60年代这期间，西方有关纳西族的研究成果。他指出19世纪70年代，西欧开始出现有关纳西族的报道，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关于纳西族文化的零零碎碎的翻译陆续出版。约瑟夫·洛克 (Josep Rock 1884-1962) 是第一个认真研究纳西族典籍的人，国际纳西学界对纳西族典籍的系统分析和翻译随着洛克的研究而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³⁾ 很多纳西学者与杰克逊持有相同的观点。因为洛克在有关纳西族语言、文化、宗教、历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斐然，被称为“西方纳西学之父”，享誉国际纳西学界。然而，有中国学者认为纳西族的“东巴经典汉译与外译始于1930年前后，主持者为美国

3) A. Jackson. Mo-So Magical Texts [J].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No.48, 1966:141.

在丽江的传教士安德鲁斯(Andrews)”。⁴⁾那么,纳西族典籍的英语翻译究竟始于何时与何人呢?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和追根溯源,我们发现早在洛克和安德鲁斯来到中国之前,荷兰传教士先驱伊莉斯·沙滕 (Elise Scharten, 1876-1965) 就已经来到云南丽江,并开始研究和翻译纳西族典籍了。而她完整翻译的第一部纳西族典籍就是《创世纪》。⁵⁾《创世纪》位于纳西族的三大史诗之首,是研究纳西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俗仪式、社会历史、哲学思想、道德伦理的重要文献,也是国内外纳西学界一直热衷翻译和研究的纳西族典籍之一。我国有研究者认为对纳西族典籍《创世纪》进行系统翻译整理的时间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末。⁶⁾然而,沙滕翻译纳西族典籍《创世纪》的时间较之更早;她翻译《创世纪》时所使用的纳西原始手稿和她的译本目前仍保存于荷兰国家博物馆。除了翻译纳西族典籍,沙滕与纳西族的语言文化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可是,在国内有关纳西族的翻译研究中,沙滕及其译作已难觅其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就有必要对纳西族典籍《创世纪》的英译者及其译本进行梳理与考辨。

第2節 纳西族典籍《创世纪》的英译者探源与考辨

如学界所言,沙滕、洛克和安德鲁斯都曾在20世纪早期翻译过纳西族的典籍文献,那他们三者之间究竟有无关联呢?如果有,关联何在?

首先,沙滕与安德鲁斯的关系比较清晰。安德鲁斯是20世纪20-30年代在

4) 白庚胜, <《国际馆藏东巴经典编目举要》的编纂背景及其价值意义>,《民族学刊》, 2018, 9(03):12.

5) 本文中提及的《创世纪》均指中国纳西族的神话史诗《创世纪》,下文简称《创世纪》。

6) 马国伟,《纳西族神话史诗《创世纪》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32.

丽江的传教士，也是沙腾的同事。1922年，安德鲁斯来到丽江。起初，两人的关系比较紧张。因为最早负责管理丽江五旬节传教士工作的克拉弗(Klaver) 辞职离开丽江之后，建议由沙腾来接替他的位置，但最终还是由安德鲁斯来接管。所以，沙腾当时对此是持反对意见的。⁷⁾ 安德鲁斯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表示不满。直到1924年底，沙腾才慢慢接受安德鲁斯的领导和管理。在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沙腾与安德鲁斯的关系日渐好转。在之后的日子里，沙腾还曾在安德鲁斯家里短住，并给安德鲁斯的两个孩子讲授数学和历史。⁸⁾ 据沙腾的日记记载，1945年9月沙腾和安德鲁斯离开丽江之后，二人曾一起先后去了印度和美国旅行。⁹⁾ 而在丽江开展工作时，安德鲁斯也曾经搜集整理了纳西族的文献典籍。1929年在英国外交部的组织下，安德鲁斯开始先将这些文献翻译成中文，然后在腾越(今云南腾冲) 再将这些文献翻译成英文，译文现保存在大英图书馆的纳西藏馆中。因此，有学者认为最早是由安德鲁斯主持了纳西族东巴经典的外译工作。但实际上，沙腾来到丽江的时间比安德鲁斯早了10年。早在安德鲁斯到来之前，沙腾就已经开始有关纳西族语言文化的学习和纳西族典籍的翻译了。

其次，安德鲁斯与洛克的关系也比较明朗。两人相识相交，互有往来，却并不要好。安德鲁斯曾在1923年8月21日的一封信中写到，佩雷里将军(General Perarei) 曾说：“克拉弗是个专横的家伙，却是安德鲁斯先生的座上客，事实上克拉弗对他既粗鲁又没有礼貌”。¹⁰⁾ 这是佩雷里将军对

7) Anderson, Allan, et al., eds. *Studying Global Pentecostalism: Theories and methods*[M].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Vol. 10. 2010:211.

8) Goodwin, Leigh. *The Pentecostal Missionary Union (PMU), a case study exploring the missiological roots of early British Pentecostalism (1909-1925)*.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ester, United Kingdom, 2013:265.

9) E. Scharten. *Reis van China naar Holland over Amerika, Diary, 1945*.

10) Cornelis Wan Der Laan, *Beyond the Clouds: Elize Scharten (1876-1965)*, Pentecostal

洛克说的。洛克又将这一评论转而告诉了安德鲁斯，两人的私交可见一斑。安德鲁斯与洛克也曾一同出游，但旅途似乎并不愉快。1931年，洛克请来协助他翻译纳西手稿的东巴未能胜任破译东巴教义的工作，徒劳一周之后，洛克将其解雇。东巴意为“智者”，是东巴教的祭师，也是纳西东巴文化的主体，他们熟悉东巴经书，主持各种宗教仪式。而东巴文则是一种比甲骨文还要原始的图画象形文字，纳西语称之为“斯究鲁究”(serjelljel)，意思是“木石上的痕记”(又译为“木石之标记”或“木石之记录”)。¹¹⁾由于东巴掌握这种文字，故称东巴文。为了放松心情，洛克便邀请安德鲁斯夫妇一起去露营。但是，“受邀的安德鲁斯夫妇恐怕成了他所有选择中最为糟糕的一对同伴。安德鲁斯先生是一个半文盲似的人物，曾经是煤矿工人，后来受上帝的感召为主服务”。¹²⁾露营途中，安德鲁斯总是以极其严格的教规来对洛克进行说教。洛克因无法忍受这些说教而不得不请安德鲁斯闭嘴。对于安德鲁斯太太，洛克也觉得她是一个“愚蠢可笑”之人。最终，三人不欢而散。简单而言，此行并没有提升洛克与安德鲁斯之间的友谊，甚至没有增加洛克对安德鲁斯的好感。

而沙腾和洛克之间的关系，学界至今并无定论。据说，沙腾和洛克一起离开了丽江，离开了中国，“洛克和沙腾一起离开了这个国家。他们一起到印度旅行，而后沙腾回到了荷兰，洛克则去了美国夏威夷州的檀香山，并在那里终老余生”¹³⁾。在丽江的日子里，沙腾和洛克成为了朋友，甚至是结伴旅行的好朋友。但是，洛克在他的著作中从没有提到过沙腾，

Missionary to China [J]. in: Wonsuk Ma and Robert P. Menzies (eds.), *Pentecostalism in Context: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W. Menzies*,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7:349.

11) 杨福泉,《纳西族文化史论稿》,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21.

12) 斯蒂芬尼·萨顿、陈立华,〈约瑟夫·洛克1930至1933年在云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6):47.

13) J.A. Hockstra. *Ontmoetingen in Lijiang*[M]. Groningen: Synaps, 1991:18.

也从未写过关于沙腾的文章，即使是在存档的私人信件中，洛克也不曾提及过沙腾。其实，沙腾参与了很多与纳西族文献相关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甚至还向荷兰国家博物馆捐赠了许多纳西手稿，但洛克对此似乎并不认可。1952年，洛克写信给约翰·里兰兹图书馆，询问图书馆纳西族手稿的来源，“我猜你们从福雷斯特先生或他的遗孀那里获得了这些手稿。我知道这些手稿是她卖给你们的。因为我和福雷斯特先生夫妇是丽江仅有的西方人。¹⁴⁾ 洛克知道沙腾在丽江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但他对博物馆宣称他和植物学家福雷斯特夫妇是丽江“仅有的西方人”，即他对沙腾的一切工作都保持了“沉默”。不过，沉默是相互的。因为沙腾对这份友谊也保持了沉默，她也未曾在自己的日记里提起过洛克。¹⁵⁾ 但是，当沙腾的名字在大众意识或学术话语中不再与纳西族的一切联系起来时，洛克的名气自然就不断上升了。实际上，洛克对沙腾的态度或许与他对传教士的总体印象有关。1922年，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农业部、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的探险家，撰稿人和摄影家等身份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的27年里，他在云南持续不断地深入研究纳西族文化，一生发表了无数与纳西族相关的研究论著。但一直以来他对丽江传教士的印象和态度都比较保守。因为当时丽江的外国人都被视为不怀好意的“洋鬼子”，很难赢得当地人的信任，这为洛克的学习和研究带来了一些不便之处。而洛克则认为外国人在丽江遭遇的这种“排外意识”，主要就是由传教士的不当行为造成的。他对这些传教士的行

14) 参见Letter from Rock to Robertson dated 30 July 1952, Mo-So Manuscripts Collection, Correspondence with J. F. Rock 1952, John Rylands Library, Manchester.

15) Cornelis Wan Der Laan, Beyond the Clouds: Elize Scharten (1876-1965), Pentecostal Missionary to China [J]. in: Wonsuk Ma and Robert P. Menzies (eds.), Pentecostalism in Context: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W. Menzies,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7:349.

为及其蔑视，也绝不接受任何把他与传教士作对比的说法。对他而言，传教士大多都是“疯狂的怪人”或是教派中的“古怪人物”。¹⁶⁾可是，当他来到丽江学习和研究纳西族文化时，让他感到尤其难堪的是：那里已经有一个不仅能够说着流利的纳西族语言，还能够翻译纳西族典籍的传教士了，而且还是一个女传教士。¹⁷⁾这个女传教士就是一一沙腾。

沙腾于1876年7月出生在阿姆斯特丹。1911年2月，她来到位于英国伦敦的五旬节传教士女子学堂接受培训。次年4月她与另外两名女传教士一起离开伦敦，前往云南丽江。她们三人也是最早来到丽江的欧洲女性。¹⁸⁾依照传教士翻译的惯例，沙腾来到丽江之后首先需要翻译的是《马可福音》。但是在一个陌生的异质文化语境中，遭遇文化休克的沙腾并没有急于开展这项工作，而是首求先助于当地的东巴，学习纳西语，了解东巴文化。在东巴的帮助下，沙腾不仅熟练掌握了纳西语的书写形式，还能用纳西语教授阅读和写作以及编写词典。¹⁹⁾

《马可福音》真正的翻译工作比预期的时间要长得多，因为它涉及到从纳西族文字系统到罗马文字系统的转化。确切的说，把《马可福音》翻译成纳西语，需要依赖于一个纳西语的罗马拼音方案。沙腾借鉴了“弗雷泽字母表”，进行了纳西语的罗马拼音改编。²⁰⁾用沙腾创写的纳西语

16) 斯蒂芬尼·萨顿、陈立华，〈约瑟夫·洛克1930至1933年在云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7。

17) E. R. Sulek. A Trip to Amnye Machen. The Diary of Joseph F. Rock, The Newsletter, No. 51, 2009:14.

18) Wonsuk Ma and Robert P. Menzies (eds.), Pentecostalism in Context: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W. Menzies[M].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7:344.

19) Wonsuk Ma and Robert P. Menzies (eds.), Pentecostalism in Context: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W. Menzies[M].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7:351.

20) 英国传教士詹姆斯·弗雷泽 (James Outram Fraser, 1886—1938) 与来自缅甸的传道士巴肖 (BaThaw) 于20世纪20年代一起创写了傣傣语，并以弗雷泽的名字命名。弗雷泽傣傣语使用拉丁字母的大写字母及其旋转版本来写辅音和元音，声调和鼻音用罗马标点符号来书写，与打字机上的标点符号完全相同。

来翻译《马可福音》并不是一项能够一蹴而就的工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整个翻译工作才算完成。英国历史学家雷特林格 (Gerald Reilinger 1900-1978)曾在他的旅行著作中提到过沙滕的语言成就:“今天晚上,当我们拜访丽江的女士们时,话题转到了纳西语或摩梭语上,沙滕小姐正在用这种语言编字典。沙滕小姐和菲茨杰拉德从相反的角度来探讨纳西语的问题。因为沙滕试图把翻译成纳西语或摩梭语的英文圣经印刷出来,好让纳西族的人能读懂圣经,而菲茨杰拉德则试图让外国人能看懂当地的文本”。²¹⁾ 不过,沙滕翻译的英语圣经也没有得以在中国保留下来。“荷兰五旬节宣教协会将部分圣经内容翻译成纳西语,但已经被废弃了。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纳西族教堂被摧毁”,²²⁾ 沙滕翻译的纳西文献的副本也和教堂一起被销毁了。尽管如此,现在依然可以在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找到沙滕的《马可福音》译本。此外,用沙滕创写的纳西文字印刷的还有一本基督教教理 (1933年,46页) 和一本赞美诗集 (1933年,69页),现保存在荷兰的家族档案馆中。毋庸置疑,沙滕当时在丽江是一名很出色也很出名的译者,毕竟她是第一批精通纳西语的外国人之一,²³⁾ 也是唯一一个把英语翻译成藏缅纳西族语言的人。²⁴⁾ 然而,沙滕与洛克之间却相互保持“沉默”,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或许已经无从考证,但职业上的嫉妒和身份上的反感可能都是洛克从未提及

21) Gerald Reitlinger. *South of the Clouds: a Winter Ride through Yun-nan*[M]. London: Faber & Faber, 1939:120.

22) Hattaway, P.& Johnstone, P. *Operation China: Introducing All the Peoples of China*[M]. Pasadena CA: 2000:395.

23) Cornelis Wan Der Laan, *Beyond the Clouds: Elize Scharten (1876-1965), Pentecostal Missionary to China* [J]. in: Wonsuk Ma and Robert P. Menzies (eds.), *Pentecostalism in Context: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W. Menzies*,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7:338.

24) Duncan, Poupard. *The Lady of Lijiang: Contextualising a Forgotten Missionary Translator of Southwest China*[J].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Vol. 94, No.2, 2018:95.

沙騰的主要因素。

通过梳理不难发现，沙滕、安德鲁斯和洛克三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一方面，三人都翻译过纳西典籍，但沙滕和安德鲁斯来到中国和离开中国时，都是传教士的身份；而洛克则不同。虽然洛克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植物学的论文，²⁵⁾但他始终是一个成功的植物学家和探索家，同时还是一个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地理学家。身披如此多学术光环的洛克对身为传教士的沙滕和安德鲁斯难免会有一些保留意见。另一方面，洛克为国际纳西学界做出的贡献远不止于翻译，也远远超越了沙滕和安德鲁斯，而且至今依然无人企及。所以，文化身份与社会地位的不同使三人在中国和国际纳西学界的接受度与被研究的深广度有着天壤之别。洛克成了研究纳西文化的鼻祖，是纳西族典籍外译无法绕开的丰碑；关于安德鲁斯的研究虽有，但甚少；而沙滕则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沙滕确实早于他们二人来到中国，也早于他们二人开始研究和翻译纳西族的典籍《创世纪》。

第3節 纳西族典籍《创世纪》英语译本的百年流变

纳西族典籍《创世纪》共分为“开天辟地”、“洪水翻天”、“天上烽火”和“迁徙人间”四个部分。在纳西语中，“创世纪”“读作ts ‘o31mbur33 ‘tu33”，²⁶⁾意思是宇宙万物的出现、人类的起源与迁徙。实际上，《创世纪》是纳西族的创世神话，也是反映纳西族古代社会和古代文化的一部

25) Aris, Michael, et al. *Lamas, Princes, and Brigands: Joseph Bock's Photographs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of China* [M].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2:22.

26) 甘露, <纳西东巴经《创世纪》中假借字研究>,《兰州学刊》, 2009(11):190.

“百科全书”。从天地万物的起源和人类的诞生开始,《创世纪》讲述了纳西族开天辟地、创世立业、民族迁徙的故事。它用万物有灵的思想来图解天地日月、风云雨雾、动物与植物、战争与爱情等的来源,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其内容涉及文学、哲学、宗教、天文、地理、语言、文字、习俗等多个领域。在纳西东巴的协助下,沙腾依据东巴的口头阐释将《创世纪》翻译成英语。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翻译工作,却一直被忽视了。翻译《创世纪》时,沙腾所使用的纳西原始手稿目前保存在荷兰国家博物馆的范维尔德文化馆(Nationaal Museum van Wereldculturen)。沙腾的译稿并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注明日期,但可以确定大约是1924年至1934年间在丽江翻译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1936年,沙腾将这份译稿与另外15本纳西族祭祀文献一起赠送给博物馆。其二:这份译稿遵循了沙腾先前给乔治·福雷斯特(George Forrest)的两份手稿的翻译模式。²⁷⁾巧合的是,洛克在1935年出版了他自己翻译的纳西史诗《创世纪》。两人的译本形式不一,各具特色,沙腾的译本是这样开始的:

On earth the spirit spoke.

The trees could walk.

The stones could open their mouth.

The earth globe could move.

All these things were, but heaven and earth were not yet created.

In heaven only the shadow of sun and moon were there ...²⁸⁾

(译文:原初,圣灵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事物/圣灵在地上说话/树木可以行走/石

27) Duncan, Poupard. The Lady of Lijiang: Contextualising a Forgotten Missionary Translator of Southwest China[J].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Vol. 94, No.2, 2018:102.

28) 参见 Nationaal Museum van Wereldculturen, RV-4175, Manuscript Scharten:1.中文译文由笔者所译。另,后文中的英语译文皆由笔者所译,不再另注。

头可以张嘴/地球可以移动/万物已有,但天地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天堂里只有太阳和月亮的影子…)

显然,沙滕的译本采用了英语诗歌中常见的诗行体形式。而洛克的译文则是这样开头的:

In the dim past, in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ngs, before heaven was, when Ndu and Sse were about to appear, and the trees were on their way, the rocks contemplated to come upon the scene, and the earth was about to be born there were three shadows which were to become heaven, and three shadows to become the earth.²⁹⁾

(译文:万物之初,一片混沌。在天堂还没有出现之前,当男神和色神即将出现的时候,树木即将出现,岩石即将出现,地球即将诞生,有三个影子将成为天堂,三个影子将成为地球。)

二者的译文相比,不同之处显而易见。首先,最明显的就是两个译本的文体形式不同。在沙滕的译文中,“圣灵、树木、石头、天堂、地球、太阳和月亮”等各自成行,属于诗行的行式,有着诗歌的意境和形式美;而洛克的译文则是一种散文叙述的模式,多了一些补充和解释,易读易懂。其次,在翻译纳西族的男神和女神时,洛克将其名字分别译为:“Ndu”和:“Sse”。而沙滕的译本则将二者混为一谈,合二为一,统译为圣灵(spirit),这种简化可能与沙滕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有关。两个译本的不同之处还有很多,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纳西族典籍《创世纪》的翻译和研究一直备受国内外纳西学界的关

29) 参见 J. F. Rock, The Story of the Flood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Na-khi Tribe,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Chengtu), No.7, 1935:66.

注。除了沙滕和洛克，纳西族典籍《创世纪》的翻译工作也吸引了国外许多不同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学者。20世纪末时，美国人类学家查尔斯·麦克汉 (Charles McKhann) 在其博士论文中就研究并翻译了纳西族的《创世纪》。麦克汉译文的开头如下：

Long, long ago, Heaven and Earth were mixed together. Dduq and Seiq had not yet given order to the myriad things. Trees could walk and rocks could talk. The earth trembled and flashed. Before Heaven and Earth appeared, there first appeared the three good kinds of shadow of each.....³⁰⁾ (译文：很久很久以前，天地是混在一起的。东神 (Dduq) 和色神 (Seiq) 还没有给万物排序。树木会走路，石头会说话。大地颤动着，闪动着。在天地出现之前，首先出现的是三种善的影子。)

纵观以上三个译本，它们在形式和内容上各有不同。首先，在涉及到“大地”的译文中，麦克汉翻译成“大地颤动着，闪动着”；洛克只是简单地把它视为创世纪的前指，翻译成“地球即将诞生”；沙滕则保留了一些神秘性，翻译成“地球可以移动”，暗示了更多的天体运动。在关于“石头”的译文中，沙滕的翻译是“石头可以张开嘴”，类似于麦克汉翻译的“石头会说话”。而且，在他俩的译文中，“树木”都是“会走路”的。但洛克没有使用这样的文学修辞手法，而是用“树木即将出现，岩石即将出现”来阐释纳西族传统的万物有灵论。那么，为什么沙滕、洛克和麦克汉三个人的译本会有如此的差异呢？除了三人采用的翻译方法不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纳西族口述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的差异。纳西族的口述文学中通常包括很多的口头阐释，而这些阐释都是无法在书

30) 参见 C. F. McKhann. *Fleshing out the bones: Kinship and cosmology in Naqxi religion*.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1992: 84.

面文稿中找到的。只有东巴才能通过口头表演来“填补这些空白”，理解文本的全部含义。与洛克和麦克汉翻译的《创世纪》相比，沙腾对东巴口述的任何内容都没有给予详尽的阐述，坚持了口头文本固有的形式和内容。当然，这也表明协助她翻译的东巴并没有对文本进行过多的阐述，只是对文字图形进行了解读。所以沙腾既不像洛克那样编辑文本内容，也不以脚注或其它附录的形式提供任何背景信息。但也正因为如此，沙腾的翻译可能“剥夺”了口述文本的叙事“潜力”和多样性。再次，三人采用的翻译形式也不一样。沙腾的译本是诗行形式，而洛克与麦克汉的译本则是散文体形式。这两种形式对我国学者而言并不陌生。1960年由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搜集翻译整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创世纪》汉语译本，以及2006年由郭大烈，杨一红主编的《纳西文化诵读本东巴文、纳西拼音文、国际音标、汉字注音、汉文五对照》译本采用的都是诗行体形式。2016年12月由丽江市博物馆、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会编，由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创世纪》采用的则是散文体形式。还有一点，文化身份的不同决定了他们三人翻译动机的不同。与学者型译者洛克和跨学科译者麦克汉的翻译相比，沙腾的翻译没有采取任何的意识形态立场，也没有涉及到任何的科研或学术机构，她的译文也从未正式地出版发行过。因为不涉及到出版，所以她的译文也没有导言或序言。当然这就意味着沙腾没有特别多的读者。从某个程度来说，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沙腾的译作现在已经难觅其踪了。

第4節 结论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挖掘民族典籍、翻译民族典籍正是我国

学者和译者当下所面临的艰巨任务。而沙腾、安德鲁斯和洛克等人则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在当地东巴的协助下开始研究和翻译纳西族典籍了。通过对纳西族典籍《创世纪》的英译探源及其英译本百年流变的考辨,我们发现最早来到丽江并开始学习、研究和翻译纳西族典籍的译者是沙腾。而她的译作之所以在80多年后的今天才重新得以提及,最主要的原因可归结为两点,一是:她的译作没有正式出版发行,没有广泛的读者、接受者和研究者;二是:她的翻译大部分都收藏在国外的档案馆和图书馆里,不便于国内学者的查找和研究。当然也有可能是受到了她传教士身份的局限。而且,如果单就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和在国际纳西学界的地位而言,身为传教士的沙腾和安德鲁斯不管是在编写词典,还是在系统收集、翻译和出版纳西族的文化典籍等各个方面,都无法与身为大学教授的洛克相提并论。所以,安德鲁斯和沙腾,尤其是沙腾,便鲜有人问津。总的来说,且不论沙腾和洛克等人的文化身份、社会地位和翻译初衷,他们对纳西族典籍《创世纪》的翻译至少在客观上弥补了我国译界存在的的一些缺憾,或者说对我国的典籍翻译和译者团队的组建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而且,他们的译本在国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不断吸引着众多不同学科和跨学科的学者加入了国际纳西学研究的行列,促进了我国纳西族典籍在西方世界的呈现和经典形象的建构,以及纳西学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传播、传承和长足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突显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化发展中的构成比例。而这也正是当下研究纳西族史诗《创世纪》百年来的英译流变及其在国内外纳西学界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和文化意义的一种体现。

▣ 参考文献

- A.Kok.On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J]. Condence, Vol.8, No.3, 1915:19.
- Aris, Michael, et al. Lamas, Princes, and Brigands: Joseph Bock's Photographs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of China [M].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2:22.
- Gerald Reitlinger. South of the Clouds: a Winter Ride through Yun-nan[M]. London: Faber & Faber, 1939:120.
- E. Scharten. Reis van China naar Holland over Amerika, Diary, 1945.
- P. Goullart. Forgotten Kingdom [M]. London: John Murray, 1955:81.
- A. Jackson. Mo-So Magical Texts [J].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No.48, 1966:141-174.
- J.A.Hockstra.Ontmoetingen in Lijiang [M]. Groningen: Synaps, 1991:18.
- Wonsuk Ma and Robert P. Menzies (eds.), Pentecostalism in Context: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W. Menzies [M].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7:44.
- Cornelis Wan Der Laan, Beyond the Clouds: Elize Scharten (1876-1965), Pentecostal Missionary to China [J]. in: Wonsuk Ma and Robert P. Menzies (eds.), Pentecostalism in Context: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W. Menzies,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7:337-360.
- Hattaway, P., & Johnstone, P. Operation China: Introducing All the Peoples of China[M]. Pasadena CA: 2000:395.
- 杨福泉,《纳西族文化史论稿》,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95.
- E. R. Sulek. A Trip to Amnye Machen. The Diary of Joseph F. Rock, The Newsletter, No. 51, 2009:14.
- 甘露, <纳西东巴经《创世纪》中假借字研究>,《兰州学刊》, 2009(11):194-197.
- Anderson, Allan, et al., eds.Studying Global Pentecostalism: Theories and methods[M].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Vol. 10. 2010:211.
- 斯蒂芬尼·萨顿、陈立华, <约瑟夫·洛克1930至1933年在云南>,《西北民族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06):46-61.

马国伟,《纳西族神话史诗《创世纪》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32.

Goodwin, Leigh. The Pentecostal Missionary Union (PMU), a case study exploring the missiological roots of early British Pentecostalism (1909-1925).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ester, United Kingdom, 2013:265.

魏清光、曾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机遇、现状、问题及对策》,《当代文坛》, 2016, (2): 109-114.

陈珺瑜,《后殖民视域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外译现状、策略、途径及出路》,《外国语文研究》, 2017(05):78-86.

Poupard, Poupard. The Lady of Lijiang: Contextualising a Forgotten Missionary Translator of Southwest China[J].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Vol. 94, No.2, 2018: 95-114.

白庚胜,《〈国际馆藏东巴经典编目举要〉的编纂背景及其价值意义》,《民族学刊》, 2018, 9(03):10-15.

〈Abstract〉

A Research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Naxi Classics *Genesis*

Zhu, YanQiu

The translation of Naxi classics has been attracting international scholars for a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have debated about who is 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or of Naxi classics for a long time, but there is still no consensus.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Joseph Locke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study the Naxi classics seriously, while others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translations of The Naxi Dongba classics began around 1930 with Andrews,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Lijiang, as the host. However, long before Locke and Andrews came to China, Elise Saarten, a Dutch missionary, had begun translating Naxi texts, including the Naxi epic *Genesis*. *Genesis* is one of the most translated Naxi books and also one of the books that Naxi scholars have been keen to study. However, it is hard to find Scharthen's translation studies of Naxi classics in China. Therefore, the translation evolution of Naxi epic *Genesis* in the past 100 years and its historical value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the Naxi academic circle at home and abroad could be better understood through sorting out and examining the Translation of Naxi classics into English.

Key Words : Naxi epic *Genesis*,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Elise Scharten,
Joseph Rock, Naxiology

이 논문은 2019년 10월 30일에 접수되어 11월 25일에 심사를 완료하고
12월 14일에 게재 확정되었습니다.